



文化散文精粹

秋燈史影

王充闾

山東文藝出版社



自序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几年前我在黄裳先生散文研讨会上陈述过这样一种意见：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创辟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都是文化散文的典范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内蒙访古》。而黄裳的分别结集于二十世纪四十、八十年代的《锦帆集》、《锦帆集外》、《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也都是上乘的历史文化散文。这一看法得到了与会诸君的赞同。

应该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坛的盛行是其来有自的。且不说，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很早以前，就传下来“文史不分家”和“六经皆史”这样两句话；单就创作规律来考究，读者之所以欢迎，作者之所以热心，起码有下述诸多因由：

一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含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

二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作用”与“陌生化”效果。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往陌生的时空，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朱光潜先生也说，“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三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

备一种文体的张力；

四是从作者角度说，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黑格尔语）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也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前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的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

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异军突起，顿呈勃兴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写景的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自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当然也毋庸讳言，随着恢弘阵势的拉开、写作队伍的泛化，这类作品也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饱遭訾议的是，凑泊故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来处置，见不到精神与情感的展示，缺乏主体性；往往是借助史料的铺陈来救治作者心灵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着上述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有自己的见解。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历史文学的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

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为此，我在创作中，努力把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命运抉择、生存困惑表现出来，用以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

在这里，现实针对性应是要旨。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抒怀寄慨，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宣泄出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太史公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此前，金圣叹也曾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其中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现实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相当一级的领导，劳形苦心，筋疲力竭，最后陷入矛盾重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履新伊始，原也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很有一番修齐治平的宏伟抱负，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许，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位古人，他就是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自视甚高，认为只要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和制作诗文没有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他是地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也缺乏透彻的认识。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我有一篇题为《用破一生心》的散文，是写曾国藩的，同样也有现实的针对性。我在市里工作时，身旁有一位领导干部，我们关系很好。可惜的是，五十岁刚过就去世了。原来，他已经发现胃部长了肿瘤，可是，由于人大只有一年就换届了，为了能够进市级领导班子，他就把病情隐瞒下来。最后，人大副主任是当上了，但因延误了治疗，致使肿瘤扩散，搭上了一条命。还有一个市的人大主任，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行动困难，但为了不致落选，在代表入场前，先让人抬着他在主席台上坐好。这样，继续当选了，但一个月后就进了火葬场。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觉得“欲望杀人”真个不假。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换了个说法：“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处来？”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我脱开惯常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上的评判，不让自己的文字成为流行观念的逻辑演绎，而是把他还原成一个现实中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人性弱点、人生困境上，具体说来就是一个“苦”字。我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慨叹他由于欲望太高太大太强烈了，因而活得太苦太累太可怜了。

我写的各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社会根源。我说，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

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

总之，我在探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内在蕴涵过程中，力求充分表达一己的主观倾向。《秋灯史影》一书，也不例外。由于我把观念交给了客体对象的个性与命运，这样，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王充闾

2009 岁杪于沈阳

目 录

自序	1
“不能忘记老朋友”	1
夕阳山外山	17
守护着灵魂上路	26
孤枕梦寻	33
终古凝眉	42
雪域情缘	48
一夜芳邻	64
断念	72
未了情	85
万古丰碑	101
欲望的神话	106
汉高祖还乡	120
忻州说艳	135
赵匡胤下棋	141

“不能忘记老朋友”

“死生亦大矣！”一个人在告别这个世界时的遗言，历来被看作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生命嘱托，一种具有纪念性、经典性、持久性的临终交代。如果当事人是一位举足轻重、影响深远的政治家，一位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伟人，那么，他的遗言就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价值。

周恩来总理在濒临生命终点时，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内政外交，内忧外患，长年累月超负荷的繁重公务，严重地损害了周总理的健康；而“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重重设障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更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这种长期、持续、强烈的“孤树加双斧”般的折磨与摧残，生生地把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拖垮了，累倒了。尽管他以永生不知疲倦的钢浇铁铸的硬汉著称，尽管他有无穷的精力和惊人的毅力，最后也不得不在疾病与死神面前败下阵来。

已经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时刻侵噬着他的内脏与肌骨，消耗着体内的营养物质，使他的身体虚弱至极。原本一米七三的伟岸身躯，最后形销骨立，只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体重。住院二十个月，经过大小手术十三次，输血八十九次，浑身上下插满了氧气管、输液管、引流管和心电图监护仪的电极板，以至连翻身都受到了限制。躺在病床上，他的胸部微弱地起伏着，颧骨高高隆起，苍白的脸庞上布满褐色的老年斑，眼睛深陷着，再也见不到往日那发光闪电、炯炯有神的异彩。长时间没

有理发了，花白的头发稀疏、蓬乱，胡须几乎遮蔽了嘴唇。过去二十多年一直为周总理理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托人带信要过来“做活儿”，可是，总理一再推辞，说：“看我病成这个样子，朱师傅会伤心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多谢了。”

总理的头脑依旧非常清晰，思维十分敏捷。面对已经叩响生命丧钟的死神，他态度安详，坦荡自若，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知道生命属于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便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光，安排好各项重要工作。大至取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选定邓小平为助手，统筹四个现代化，遍及经济、科教、外交、军事和“全面整顿”，小到文件的归还、死后骨灰的处理，一一做出最后的交代。

1975，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铑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道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着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到罗青长匆匆赶到二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

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以正当的裁判。也只有人民，才会真正坚持释放张、杨。那些担保张、杨无事的大人先生和太太们，却早已忘恩负义，食言而肥。在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他们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请托来自台湾的朋友设法保护张学良，并对他们说：“如果张将军的生命有个一差二错，我们就不好见面，不好说话了。”1958年12月，已经定居美国的宋子文来到香港小住。周恩来听说后，立即请宋子文当年的随员郭增凯代为传话，推动这位西安事变中的“担保人”，为释放张学良出力。郭见到宋就说，北京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您曾做过三条保证：第一条是停止内战；第二条是对日抗战；第三条是确保张、杨两将军的安全。北京的老朋友想请教宋先生，这三条保证如今落实得怎样了？这次传话，虽然按照周总理指示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宋子文心知肚明，迅即传回话来，说“头两条都早已兑现了”；至于第三条，“请转告周恩来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实在无能为力，请予谅解”。

1961年，在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周恩来在讲话中高度肯定了“事变”的重大意义，并对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张学良的四弟、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张学思，感情不能自抑，激动异常，在给周恩来敬酒时，竟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大家说：

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想起他们怎能不落泪呢？

至此，一腔悲愤之情与怀念之殷，再也无法控制，于是，周总理决定给失去联系多年的张学良亲笔写一封信。只是，海峡两岸一水中分，虽然近隔咫尺，但是要给张学良寄信却是难上加难。找谁才能冲破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把信安全地送到张学良手中呢？最后，中央有关部门找到了在香港定居的朱湄筠女士。她在台湾有许多亲友，本人又对祖国大陆情感深厚，特别是父亲朱启钤先生晚年在京承蒙周恩来和政府的厚待，心存感激。朱女士当即答应，要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她于1962年4月到了台湾，一直等到10月10日才找到了机会。这天，张学良参加一项公开活动，她通过早年相识的一位朋友，把密封在糖果盒底层的信转交到张学良手里。老将军拆开这封既没有上下款、又无收寄地址的天外飞来的瑶函，看到气势飞扬的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由于从前他曾多次与周恩来书信往来，所以，一看便知出自周公之手。他为在北京的老朋友并没有忘记他，为这饱含意蕴、一往情深的话语，为老朋友的周到细心、时刻以他的安全为重的关怀所深深感动，顿时热血沸腾，潸然泪下。

三

“平时不下泪，于此泣无穷。”周恩来和张学良都是意志力极为坚强的人，是中外闻名的硬汉子。可是，为了张学良的被难，周恩来竟先后三次在大庭广众之中痛哭流涕；而羁身孤岛、沦为阶下囚的张学良，也以同样真情灼灼的泪水与之对接，从而汇成一股连接两岸、绵延不绝的情感涡流。

张学良把结识周恩来引为终生幸事。西安会面之后，他对周恩来一直感念不忘。1937年2月，东北军骑兵军长何柱国奉当局之命，前往溪口会见幽禁中的张学良。听过汇报之后，张学良公开给杨虎城、于学忠各写了一封信，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一切都无足顾惜；嘱告东北军将士和衷共济，“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并要何柱国暗中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但交下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这个朋友，指的就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来。张学良还避开看守，把写给周恩来的密信交给何柱国。很快，周恩来就收到了，信中写道：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释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亦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因为顾及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周恩来与何柱国从未对外披露过这封信。

1946年4月19日，周恩来又收到监禁中的张学良从贵州桐梓县天门洞捎来的一封信：

别来十年，时为想念，（兄）当有同感。现日寇已经驱出，实最快心之事。尔来兄又奔走国事，再做红娘。愿天相早成佳果，此良所视想也。近日友人惨死，数难闻之，为之一痛，只心吊而已。良一切尚好，勿念，余不尽言。

前无收信人姓名，后无落款，显然不是张学良一时疏忽，而是当时险恶的处境使然。此信应为前往贵州探视的东北元老莫德惠带往重庆交给周恩来的。“奔走国事，再做红娘”，系指周恩来抗战后在重庆重开国共和谈；“近日友人惨死”，说的是“四八惨案”中王若飞、叶挺等所乘飞机在黑茶山遇难一事；“数难闻之”，当指年初发生在重庆的“白沧堂事件”和“校场口事件”。出于同样考虑，此信也是一直没有公开。

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的周恩来深知，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张、杨极为忌恨，杨虎城一家四口惨遭杀害，就是明证。在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周恩来担心大陆方面对张学良过于直白的关怀和赞誉，会刺激蒋介石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致使张学良的处境更加险恶。因此，曾多次囑告有关部门，所有涉及张学良的宣传、报道都要严格掌握分寸，一定要顾及其人身安全。1974年，香港的一些朋友得悉蒋介石已经身染沉痾，想趁机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重病中的周恩来得知后，在热情称赞这种伸张正义的行为的同时，耐心劝阻他们暂时不要这样做。周恩来说：

蒋介石还没有去世，但他对张学良的忌恨已经淡化了。你们这么一呼吁，戳了蒋介石的疮疤，可能会刺激他重演西太后的故伎，在自己临死前对张学良先下毒手，结果反而对张学良大大不利。

张学良愤慨于蒋介石背信弃义、践踏承诺，十年监禁使他吃尽了苦头；他自然渴望着尽早摆脱罗网，恢复自由，可说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这个机会终于出现

士，体现了一片革命真情，留下了许多动人佳话。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贺龙就受到林彪、康生、江青的诬陷，东交民巷的家也被造反派进驻了。为了保证贺龙的安全，周恩来先是安排他到新六所住，后来又改在他家西花厅的前厅。可是，“一月风暴”的飓风也刮进了中南海，这里还是不行，周恩来便又把他们夫妇安排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尽管周总理尽全力加以卫护，但贺龙最终还是被迫害致死。1975年6月9日，周总理拖着极度衰弱的病体，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他见到贺龙夫人薛明时，声音颤抖地说：“我没有保住他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

在红卫兵破“四旧”、乱抄家、乱揪斗的狂潮中，许多民主人士首当其冲，大难临头。他们大都是与中共长期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老朋友，为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过很多贡献。周恩来日夜操劳，多方奔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他把在上海遭到冲击的宋庆龄先生请到北京，并指派他的保卫人员担任安保工作；下令上海有关部门立即修复遭到破坏的宋家墓地；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亲自为新编的《宋庆龄文集》题写书名，以抚慰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宋庆龄副主席。1974年，住院治疗中的周总理，得知傅作义生命垂危，不顾医生劝阻，仍然亲自前往医院探视。总理拉着傅先生的手说：“您对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劳的。”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了这一番话，心情十分激动，眼里闪现着晶莹的泪花。

1975年8月24日，周总理拖着虚弱的病体，在北海公园散步，面对澄碧的湖水，长时间地凝望、沉思，然后转身向随行的医护人员问道：“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九年前的这一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不堪“造反派”的污辱和毒打，投湖自尽。周总理闻讯后，异常痛心，满腔愤怒地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呀？！”深为没有保护好这位老朋友而痛苦自责。事发后第五天，他便亲自起草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经毛主席批准，使一大批有功于人民的重要领导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免遭迫害。

解放前，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抨击官僚资本而被逮捕，周恩来四出奔走，将他营救出来。但蒋介石不准他出任公职、教书、讲演和发表文章，以致生活十分困窘。周恩来指示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刊载马寅初的著作《中国工业化与民主》，并致送最高稿酬，一时在国统区知识界传为佳话。1957年，马寅初因发表《新人口论》，被批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康生等人要把他划为右派，

周总理出面回护，使他得以幸免。1972年，九十高龄的马寅初患直肠癌，经总理亲自批示，及时施行手术治疗，使其身体得到了康复。而正是这一时刻，周总理本人也不幸罹患癌症，却因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留下了致命的后患。马老从他与周恩来的几十年交往中，由衷地作出评价：“周恩来是最得人心的共产党员。”

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帮助党外朋友解决具体实际问题。他曾亲自为宋庆龄、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冯玉祥等爱国民主人士祝寿；亲自安排为司徒美堂制备衣物，以抵御北京气候的严寒；为齐白石老人整修庭院；为老舍先生装修地板、求医治病……许多民主人士感动地说：“周总理不愧为‘周’总理！真周到。”老舍夫人胡絮青说：

总理善解人意，他懂得尊重人。在与演员合影时，大家出于尊重，把中间位置留给他，他却总是让给那些老艺术家。在他身上，你永远找不到强加于人、强迫命令、“我说了算”的感觉。他永远是用商量的口吻同你说话。他对文学艺术上的一些见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不接受也不要紧。这就是周总理。所以，在文艺圈子里，他的朋友最多。

冰心老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们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付与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周恩来长期主持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特殊的历史功勋。他在同党外人士交往中，一贯襟怀坦白，输诚相与。他说：“对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人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他提倡共产党人要敢于交畏友和诤友，“要尊重人家的意见，让人家把话讲完，使党外人士在各种场合都敢于讲话，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影响、教育、团结了广大民主人士。许多党外朋友都把他看作披肝沥胆、最堪信任的知己，使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凝聚力、亲和力，使各方面的盟友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共

产党的主张，做到同甘共苦，并肩前进。

五

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评价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其德行、品格与思想。历史上，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感召力、影响力的核心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他们的道德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一致性和普世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而周恩来正是那种把政治抱负的实现与理想人格的塑造高度统一起来，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

总理生前，时刻以国家、民族为重，他把个人的得失、进退、忧乐、荣辱，同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命运完全融为一体，真正做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冷静而坦然地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生前，他没有儿女，没有财产，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堪称“平民宰相”；死后，完全没有自己。清清白白地来，干干净净地走。

1976年1月11日薄暮时分，十里长街两侧，百万群众冒着严寒，自愿为周总理送灵，北京城和整个祖国大地，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周恩来赢得人民如此由衷的敬仰和爱戴？当然与他的伟大功业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自身有着崇高的品格修养——他把中华人文传统升华为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他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真正的心灵契合；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同志、对朋友、对人民的真诚爱心和人格尊重。

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对于革命者来说，这是经常碰到并且较难处置的两对矛盾。而周恩来却是妙手天成，处理得圆满无缺，非常出色。他能做到情于所当情，理于所当理。抗战时期，与中共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先生去世时，周恩来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且常共起居，而

1991年3月10日，我们的主人公汉卿先生，身着灰色西装，头戴法兰西便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墨镜，在夫人赵一荻女士陪伴下，仪态从容、步履稳健地步入了台北桃园中正机场。他们要从这里乘坐华航飞机，前往美国探亲。这是他第三次出国了。第一次，东渡日本观操，那年他刚满二十岁，自是少年得志，意气扬扬；第二次是1933年，抗战失利，引咎辞职，怀着痛苦、沉重的心情前往欧洲考察；这次的心情又怎样呢？刚一照面，记者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笑嘻嘻地回答：“我觉得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接着，又开起了玩笑，“别人都说我成了电视明星，你们采访我，我可要向你们收钱了。”

说“不知道是什么心情”，自然是调侃；但他此刻的心境，确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表达清楚的。说是悲欣交集，百感杂陈，也不为过。欢快呀，激动呀，自不必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轻松感、自由感可能要占主导成分；再就是，怀念、牵挂与期盼。

此行何为？他向台湾当局讲的唯一理由，就是去看望子女。不过，汉公私下里曾对几位友人说过，要去纽约会朋友，会的是女朋友。这番话，宛如一块大石头投入水中，立刻激起了轩然大波。汉公在美国还有女朋友？简直是天方夜谭！莫不是又在开玩笑吧？但细一琢磨，又觉得不像：笑话里的“包袱”，冷不防地一抖，才能抓人儿；哪能说了再说、重复多遍呢！

于是，人们进行猜测：显然不是已经解除婚约的于凤至，这位老人已于一年前去世了；那么，该是蒋夫人宋美龄吧？她可是汉公几十年的挚友啊！而且又长住纽约。不过，据知情人讲，这段时间蒋夫人恰恰不在美国……不管是谁，反正是有所爱就有怀念，有怀念、有牵挂就有期盼吧！

汉公夫妇所乘飞机在旧金山着陆以后，就被女儿、女婿接到家去了，自有一番诉不完的离绪别肠，说不尽的天伦之乐；四天过后，老两口又去了洛杉矶，数日勾留中，除了同子女欢聚，还拜扫了于凤至墓。然后，夫人留下来，汉公由孙儿、孙媳陪同前往纽约，下榻于曼哈顿花园街贝夫人的豪宅，一住就是三个月。这样，“女朋友”之谜也就揭开了。

贝夫人名叫蒋士云，1910年出生于苏州。称为“四小姐”者，是因为她的前面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她自幼聪明颖慧，俊俏可人。从小就打下了英语的功底，后来，跟着当外交官的父亲到欧洲大陆，在法国巴黎留学。与少帅相识于1927年的

关押起来失去了自由，万分挂念，当即同于凤至一道，投入到营救活动之中，共同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奔走呼号。后来，她听说少帅被囚禁在奉化的溪口，便直接与军统局联系，经过批准，前往探视。多年以后，少帅被押解到台湾，贝夫人又专程从美国飞赴台北，再次探望这历经苦难的知心朋友。红颜知己的“惊鸿一瞥”，对于已成“涸辙之鲋”的少帅来说，直如清泉灌注，润泽心胸。走后多日，他还感到挚友的知心话语仍在耳边萦绕。而挂在贝夫人嘴上的，则是：

少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为人豪爽，重承诺，讲信义。……我认为，张将军是那种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

一般认为，爱缘于情，似乎与理智、逻辑不相干。实际上，只要是认真而实在的爱恋，都具有严格的选择性，就是说，排除不了理性的参与。有人对世界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无数种爱恋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在这里，直觉表现为一种潜在的、十分敏捷的逻辑，亦即对所爱者的直觉评判，往往是惊人的透彻与准确。从而，一经认同，便历久不变。

二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已是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有幸在万里之遥的异域重逢，重拾旧日情怀于生命的黄昏，给这场“柏拉图”式的绝版情爱，画上一个虽不满足却也满意的句号，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贝夫人觉得，当日风云叱咤、活虎生龙般的少帅，在五十四载的软禁中，度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涩岁月，冤枉、委屈且不说，也实在是太亏欠、太熬苦了！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作一次有效的补偿，这昂藏的七尺之躯，岂不是空在阳世间走一遭！“所以，这次，”贝夫人说，“我一定让半生历尽苦难的汉公，真正感知到人生的乐趣”；要他见见老朋友，广泛地接触各界，也体验一下国外的社会生活，“看看我们在美国怎样过日子”。

好在汉公虽已年届高龄，但身体尚称硬朗，尤其是来到了纽约之后，就像吞服了什么灵丹妙药，容光焕发，声音洪亮，精神头十足，兴致异常高涨。为此，贝夫